



(修订版)

敦煌石窟寺研究

宁强 著

敦煌石窟，是汉唐以来敦煌郡沙州管辖地区内的石窟总称，包括今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的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肃北的五个庙石窟和个庙石窟，以及玉门的昌马石窟等。敦煌石窟的历史是一部最具代表性的系统的石窟艺术编年史。

*Studies in the Cave-shrines
of Dunhuang*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宁强 著

Studies in the Cave-shrines of Dunhuang

敦煌石窟研究

修订版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敦煌石窟寺研究 / 宁强著. — 2 版(修订本).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527-0436-5

I. ①敦… II. ①宁… III. ①敦煌石窟寺—研究 IV.

①K879. 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123425 号

敦煌石窟寺研究(修订版)

Studies in the Cave-shrines
of Dunhuang

宁 强 著

出 版 人 : 王永生

责任编辑 : 杨继军

校 对 : 马吉庆

封面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 730030

电 话 : 0931-8773257(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印 刷 :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张 : 17

插 页 : 1

版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本版印数 3000 册, 累计印数 5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7-5527-0436-5

定 价 : 1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 001

- 一、敦煌石窟寺及其发现史 / 001
- 二、敦煌石窟艺术的总体结构 / 018
- 三、敦煌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 / 023

第二章 敦煌石窟艺术的起源与历史分期 / 035

- 一、石窟寺诞生前的敦煌绘画艺术 / 037
- 二、莫高窟第一个洞窟开凿的时间、地点及其性质 / 041
- 三、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分期 / 045

第三章 敦煌石窟早期艺术（前秦—北周） / 051

- 一、北凉：佛教艺术与地方政治史 / 052
- 二、北魏：敦煌石窟艺术风格的初步形成 / 070
- 三、西魏：南朝艺术的冲击 / 087
- 四、北周：不同风格与思潮的并行 / 099
- 五、敦煌石窟早期艺术的供养人与画师塑匠 / 110

第四章 敦煌石窟盛期艺术（隋—盛唐） / 117

- 一、隋：艺术的变革与追求 / 119
- 二、初唐：敦煌模式的初步形成 / 139
- 三、盛唐：敦煌风格的确立 / 156

第五章 敦煌石窟中期艺术（中唐—宋） / 175

- 一、中唐：异族统治与石窟艺术形式的转变 / 176
- 二、晚唐：世俗力量对宗教艺术的影响 / 193
- 三、五代、宋：曹氏画院及其作品 / 212

第六章 敦煌石窟末期艺术（西夏—元） / 235

- 一、西夏：党项族统治与敦煌藏传佛教艺术 / 235
- 二、元：蒙古族供养人与密教艺术的流行 / 243

附录 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基本形象 / 249

第一章 总论

一、敦煌石窟寺及其发现史

佛教徒供养开凿的石窟，其实也是一种寺庙，也是供人礼拜修行的场所，所以又称为石窟寺。但石窟寺与普通的佛教寺庙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石窟寺通常开凿在悬崖峭壁上，而普通寺庙则多建于平地之上；石窟寺的内部空间，包括四壁和窟顶，通常布满了壁画和塑像，很像一个装满了艺术品的画廊，而普通的寺庙内除了供信徒礼拜的佛、菩萨像外，其他艺术形象不多，更像是供人活动、居住的建筑空间。敦煌石窟寺，由现存的开凿在悬崖上的数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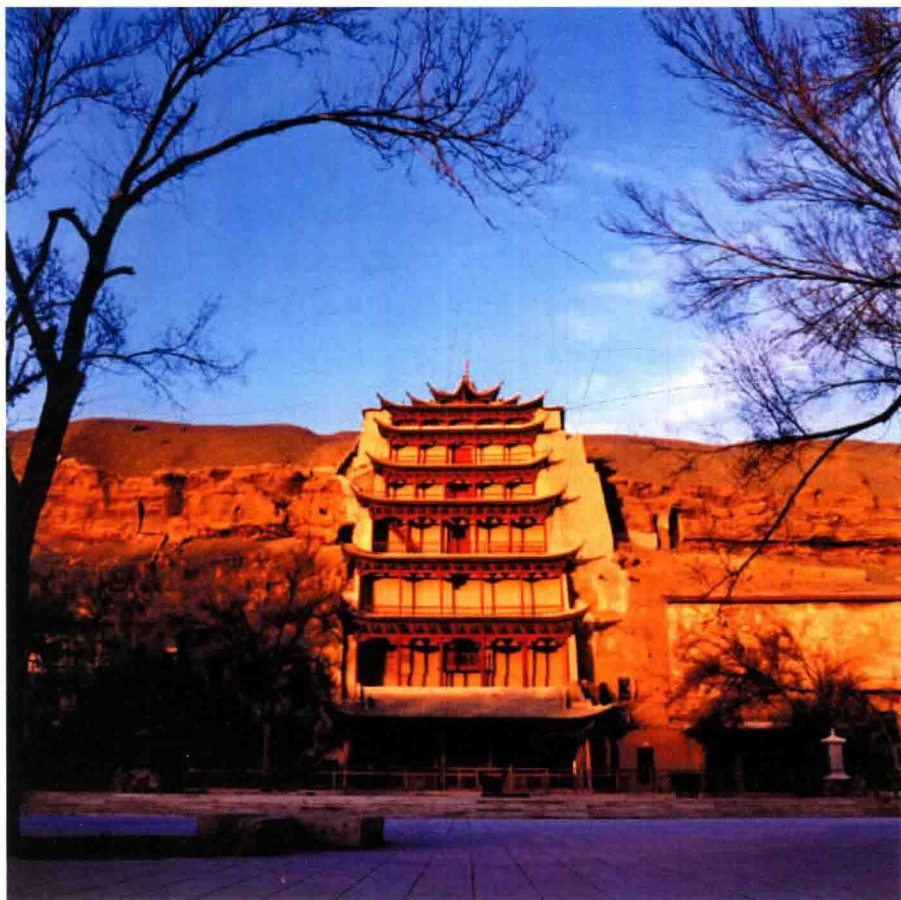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莫高窟外景



图2 敦煌莫高窟北区残窟外观

个充满壁画和彩塑的洞窟组成。对现代人而言，窟内保存的重要的文物是古代佛教艺术品，因此，敦煌石窟寺又被称作敦煌佛教艺术。

广义上讲，敦煌佛教艺术是指产生、发展和留存在敦煌地区主要以佛教为主题的艺术。它是一个多门类的艺术综合体，囊括了建筑、壁画、彩塑、绢画、纸画、麻布画、版画、书法、乐舞、染织和刺绣等。但其艺术主体，是现存的石窟群，即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小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和一个庙石窟等。其中莫高窟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好，是整个石窟群的中心，也是本书

研究分析的重点。(图1)

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寺，上起4世纪左右的十六国时期，下迄20世纪初的清末，除明代(1368—1644)的近三百年间外，每代均有大批艺术品，历时1200余年。现存洞窟总数约587个，其中莫高窟492个；西千佛洞22个；榆林窟42个；东千佛洞23个；五个庙石窟6个；一个庙石窟2个(莫高窟北区残洞未计入)。现存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彩塑近三千身。此外还有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纸画近千幅，写本数万件。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又在敦煌莫高窟的北区发掘清理二百多个规模较小，壁画、塑像大多残破或消失了的石窟，如果把这些洞窟也计算在内，敦煌石窟的总数就该有800个左右。(图2)

由于敦煌地处中国西北部的荒凉地带，东经 $92^{\circ}13'\sim 95^{\circ}30'$ ，北纬 $39^{\circ}40'\sim 41^{\circ}40'$ ，周围是戈壁瀚海，人烟稀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本地的一些信徒前来洞窟里烧香拜佛，敦煌的石窟几乎被人类文明忘记、忽略了。人们大多只知道希腊的神庙、罗马的大教堂和斗兽场、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犍陀罗，却不知道在亚洲内陆的沙漠中，还有一座古代东方最大的艺术宝库——敦煌。

实际上，由于宋元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丝路沿线的贸易中心迅速走向衰落。敦煌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明朝政府更是以敦煌以东的嘉峪关为西部边界，把敦煌的人口往东迁徙，安置在嘉峪关内，敦煌成了“化外之地”，人烟稀少，佛教圣地莫高窟，从此逐渐被人遗忘。直到清王朝建立，重新开始经

营西域，敦煌才又成为一个县，并有一些移民来此安家落户，但这个昔日的国际贸易中心，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已变成西北荒漠中无足轻重的边远小县，莫高窟也基本无人问津。那么，是什么突然改变了敦煌的命运，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呢？那就是藏经洞的发现(图3)。

藏经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藏有佛经的洞窟。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较小的洞窟，而且，里面藏的也不只是佛经。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也就是1900年5月26日，荒凉的莫高窟和平时一样寂静，住在洞窟北头残破的寺庙下寺里的道士王圆箓早早起床，开始了他每天的生活：先给供奉的老君像和佛像上香，吆喝小徒弟清扫破败的院子，然后提醒雇来的写经生，该是抄写经书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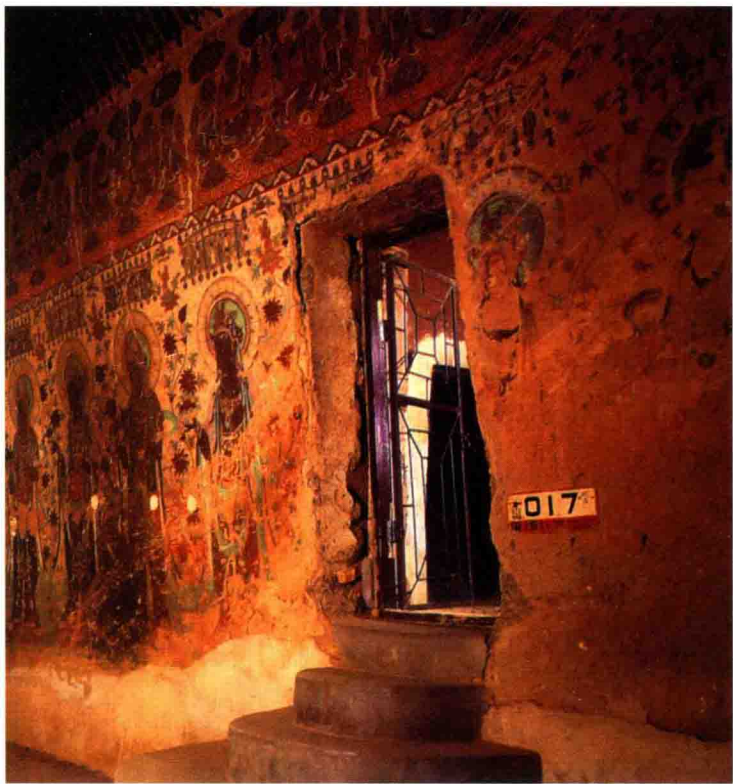


图3 敦煌藏经洞（17窟）入口

写经生姓杨，喜欢吸烟。他被安排在一个巨大洞窟宽敞的入口处抄写经文。这天他点过烟之后，便把簌簌草棍往墙缝里插。大概这一次插得重了点，草棍居然掉进墙里去了。杨先生觉得奇怪，叫来王道士一探究竟。他们发现，这条裂缝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封闭的洞窟。挖开门洞一看，他们都惊呆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数万卷古代文书和画卷，堆满了整个洞窟！

王圆箓道士（图4）的宗教信仰是很杂的，他是个道士，却住在佛教石窟前，而且把辛苦化缘得来的钱，用来清扫佛教石窟里的沙子，他还请人在佛教洞窟里塑道教神像。不过，他对神灵还是有些敬畏的，怕遭惩罚。把这个洞原样封起来，免遭报应，是他的处理方法。其次，发现了这么多古书、古画，王道士虽然不一定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但这是些值钱的东西，他应该还是知道的，否则他后来也不会向斯坦因要大笔的银子，以至于斯坦因暗地里骂他“厚颜无耻，贪得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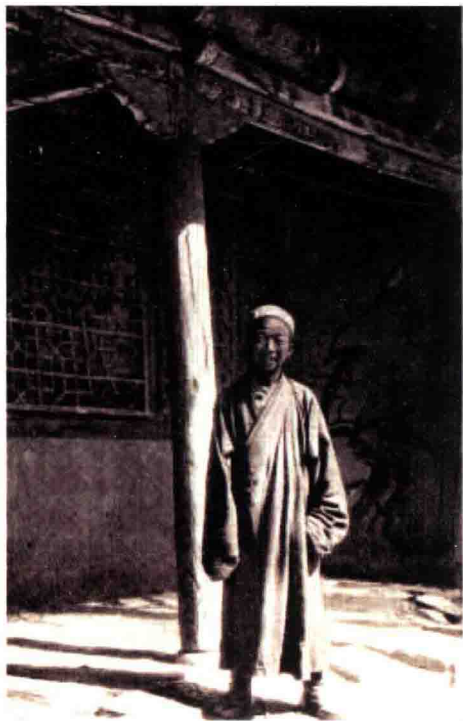


图4 王圆箓像



图5 斯坦因像

厌”。所以，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隐瞒不报，等待机会，出售这批古籍、古画发大财，对王道士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在清代末年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普通人最怕的还是得罪官府，所以，王道士虽然畏惧神灵、贪财，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报告官府，听候官方指示。然而，这时的官府很难顾及这些沙漠里发现的文物，因为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正用洋枪洋炮在天津和使用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激战。洋人的炮口很快就要指向北京，朝廷里人心惶惶，哪有心思听王道士讲什么沙漠里发现的文物呢！

等了很长时间，王道士才接到来自官方的指示，要他“就地封存保管”。王道士自筹经费，雇人砌了一堵墙，把这个装满古代经卷、文书和绘画的洞重新封起来。当然他也没那么听话，洞窟封闭前，自己偷偷拿出一些

书法工整的文书和保存完好的绢画，用来结交当地的权贵人物，满足其收藏古董、附庸风雅的嗜好。

七年时间过去了，藏经洞发现的消息在流传，莫高窟仍然无人问津。直到1907年初春，英国的考古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命运从此改变。

斯坦因原籍匈牙利，他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但他除了会说匈牙利语外，很小就学会了德语。十岁那年，斯坦因被送到德国读书，很快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后来他返回匈牙利读大学预科，开始接触到东方文化。他的老师洛克齐（Lajos DE Loczy）曾经在1879年考察过敦煌千佛洞，是第一个将敦煌艺术介绍到欧洲的人。看来斯坦因和敦煌的缘分还真不浅，在他还没有正式进大学前，就已经知道了敦煌石窟的存在。（图5）

按照当时中欧地区的惯例，学生在预科毕业后可以选择去自己喜欢的大学听课，选择导师，获取学位。斯坦因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并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1883年获得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年仅21岁。经导师推荐，斯坦因获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东方语言学 and 考古学。在此期间，他曾经返回匈牙利接受一年的义务军训，学会了地形测量和制图技

术，这对他后来的中亚考古有很大帮助。军训完回到英国，他结识了英国最有名的东方学家之一——罗林森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 1810—1895）。罗林森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皇家亚细亚学会主席，而且在印度议会中地位显赫。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受英国人统治的。1886年，斯坦因的博士后研究即将结束，罗林森向印度议会推荐他出任新建的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双职。当时斯坦因年仅24岁，他立刻起程前往印度，从此开始为英国效力，一直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工作，并在1904年正式加入英国国籍。此后，由于斯坦因在中亚考古探险的巨大成功，英国女王亲自接见他，并封他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他终于成为一个体面的英国上流社会人士，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中国敦煌藏经洞弄到手的无价之宝。^①

斯坦因是怎样把藏经洞的文物弄到手的呢？1907年的春天，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各级政府官员是人人自危，无暇他顾。斯坦因已成功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古探险，再次来到中国准备大干一场。他的这两次中亚考古探险之行都是在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下，由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亲自批准的。斯坦因于1906年4月出发，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新疆的喀什，在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住了两周。这个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当时很有名，是英国与德国、法国和俄国争夺中亚地区霸权的指挥部。

斯坦因是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城的。前面提到，斯坦因没正式进大学前就听他的老师洛克齐谈起过敦煌千佛洞的艺术，这对一个才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像神话般遥远。现在，他终于来到敦煌，而且听说了一个他的老师也不知道的重要消息：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个装满古代文书、绘画的藏经洞！得到消息后，斯坦因匆匆赶往离城25公里的千佛洞。到了千佛洞之后，他既兴奋，又失望。兴奋的是，他从小和尚手里看到了一件古代的写本佛经，证实了藏经洞的传闻是真的！失望的是，拿着钥匙的王道士外出未归，要等两个月以后才会回来！

斯坦因决定在敦煌等着！他先去了敦煌境内的汉长城遗迹作考古发掘，结果发现了一大批极有历史价值的汉简。两个多月以后，斯坦因回到了千佛洞，终于见到了王道士。斯坦因先派他的翻译蒋师爷去找王道士，要求将藏经洞里的写本文物全看一遍，但遭到王道士的拒绝。斯坦因急了，决定亲自出马，与王道士谈判。见王道士之前，斯坦因也做了些准备工作，他看见莫高窟前的木构建筑上画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估计王道士对此会有兴趣。所以一见面，斯坦因就说他是从印度来的，古时候唐僧去印度取经，把大量佛经从印度带回了中国。一千多年过去了，他要把佛经重新带回印度去。斯坦因编的故事，果然使王道士受到感动，同意让斯坦因观看藏经洞里的所有藏品。

斯坦因开始在藏经洞门口的洞窟甬道里一件件检查王道士抱出来的写本文书和绢画织物等，仅仅看一遍，就花了整整七天时间，由此可见藏经洞文物数量之大！斯坦因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写本文书和绘画作品挑选出来，共有一万多件，大概是藏经洞文物总数的五分之一，据说是以40块马蹄银买了下来。

^① 陆庆夫、王冀青《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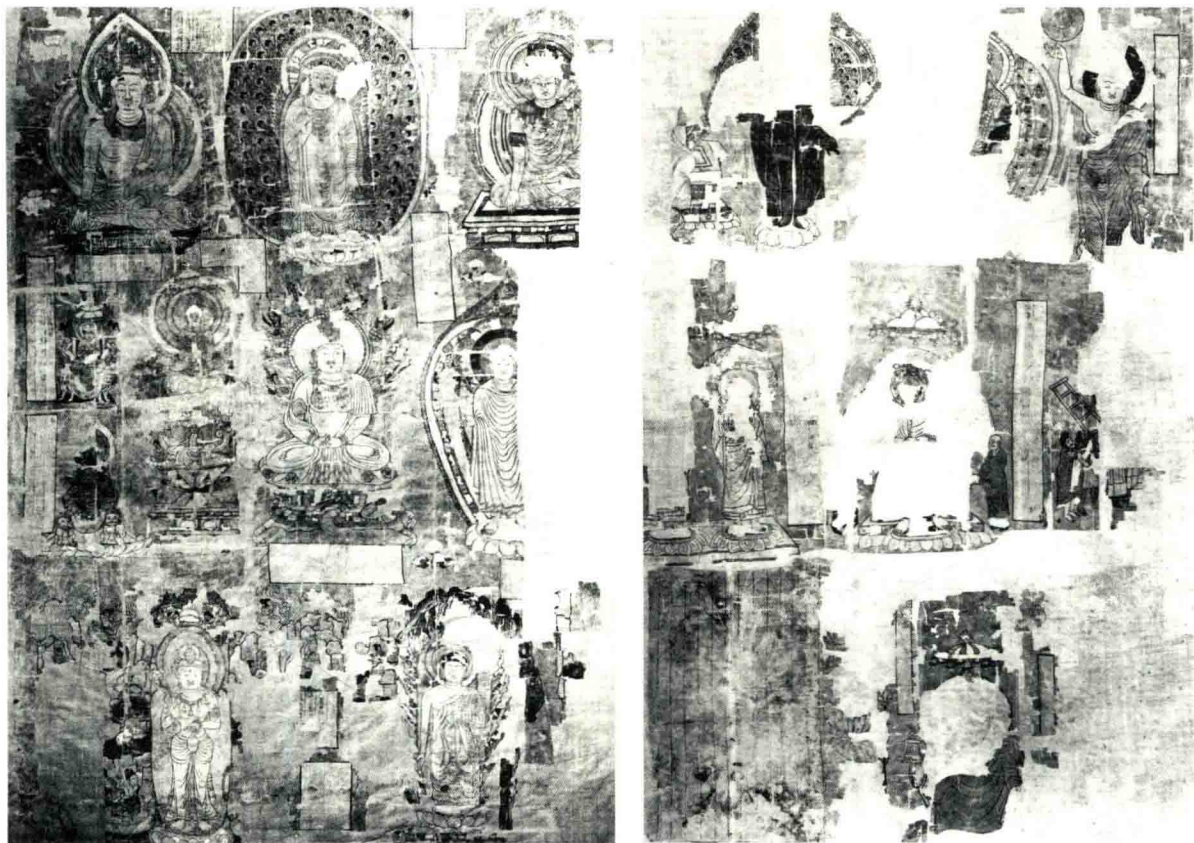


图6 被英国和印度分割的敦煌藏经洞绢画

40块马蹄银究竟是多少钱呢？有人做了推算，一块马蹄银相当于50两银子，40块马蹄银就相当于2000两银子。

斯坦因弄到这么一大批藏经洞文物之后，雇了一个骆驼队，把从藏经洞获得的古代文书、经卷和绘画装满12个大箱子，于1907年6月13日运离了莫高窟。其后，这批文物被运到英国首都伦敦，艺术品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文献资料则进了大英图书馆。

最令人叹息的是，当印度获得独立时，要求“分赃”。因为斯坦因到敦煌探险的钱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出的，大英博物馆不得不同意平分斯坦因在敦煌获得的一千多幅绘画作品。英国和印度分这批画时，很像土匪平分抢来的财物：你拿一件，我拿一件；我拿一件，你再拿一件。分到最后，剩下一张一米多宽、两米来高的唐代大幅绢画，时代既早，画面更是精美，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用刀割开，一家一半！好好的一张画，在藏经洞里完整地保存了一千多年，现在却被割成两半，分藏在两大洲的两个不同的博物馆里！这种掠夺式分赃，是对古代文物的破坏和对人类文明的蔑视。（图6）

斯坦因走了以后，藏经洞文物的劫难才刚刚开始！当斯坦因还在新疆喀什准备开始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一支法国政府部门和民间学术团体共同支持组织的中亚考察队已悄然离开了巴黎，领队的年轻专家名叫伯希和（Paul Pelliot）。

在西方亚洲文明研究专家的眼里，伯希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被尊为“20世纪最伟大的

中国学家”，还被看作“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除了精通欧洲主要语言外，他还精通汉语、梵文、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越南语等。据说他在从巴黎到塔什干的十天旅行途中，就学会了俄语和突厥语，其记忆力之强和语言天赋之高，确实令人惊叹。而伯希和这种超常的语言能力和他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使他在挑选藏经洞文书写本时，远远超过了斯坦因，选出的东西大多是价值连城的精品。^①

伯希和抵达敦煌莫高窟的时间是1908年2月25日，此时离斯坦因带着他获得的藏经洞文物离开莫高窟仅八个月。本来伯希和以为斯坦因之后，藏经洞里的文物应该所剩无几，但当王道士打开藏经洞的门锁，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成千上万的古代文书和绘画，其数量之多，足可以把他深深埋葬！面对如此巨大的资料库，伯希和仍然决定运用他超强的语言能力和丰富的汉学知识，把这些文本从头到尾检阅一遍。在昏暗的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周时间，在藏经洞狭小的空间里，把所有写本仔细翻检了一遍，甚至连难以记数的写本残片也未放过。他把最有价值的写本和绘画全部挑出来，然后与王道士交涉，用五百两银子拿走了藏经洞文物的精华（图7）。

除了挑选藏经洞的写本和绘画，伯希和为莫高窟的洞窟编号，仔细记录壁画上幸存的文字题记，并和考察队的专业摄影师一道，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就让后人要对伯希和另眼相看了，因为他不是普通的盗宝者，而是花了很长时间，仔细从事考古学的资料收集者。他的编号，学者现在还在使用；他记录的壁画上的文字题记，更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题记现在已看不见了，我们只能依赖伯希和的记录从事相关研究。伯希和的摄影师拍摄的洞窟照片，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版成六卷本的大画册，这是对敦煌石窟图像资料的第一次详尽系统的公布发表，为无法到敦煌从事实地考察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机会。

离开敦煌后，伯希和带着一箱他从藏经洞获得的珍贵写本去了北京。伯希和是1908年10月到达北京的。在著名的



图7 伯希和在藏经洞内挑选古经卷文书

^① 陆庆夫、王冀青《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六国饭店公开展出了他随身带去的敦煌古写本，并用流利的汉语作了一次演讲。前来参观和听讲的中国学者包括罗振玉、王仁俊、蒋斧、董康等著名史学家。伯希和展览的敦煌古文书，让中国学者大感震惊，因为当时学者们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图书，宋代的版本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突然有早得多的六朝、隋唐古写本出现，而且来源清楚，货真价实，毫无疑问，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北京的学术界。

首先采取行动的人，叫罗振玉。公元1866年，罗振玉出生于清朝一个官僚家庭，祖籍浙江。他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学术训练，喜好金石、碑刻文字的考证研究，三十岁以前，就已经出版近二十种著作，成了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中两件使他名垂青史，一件使他遗臭万年。

第一件，就是抢救敦煌藏经洞文献。当罗振玉在六国饭店看到伯希和展出的敦煌古写本时，他是“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又听说敦煌藏经洞还保存有六千多件六朝至唐宋时期的古写本，便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学部。罗振玉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消息后的反应与王道士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先报告给官方，让政府官员来处理这个事。王道士报告上去后，官方根本没反应，他一直等了四年，直到1904年才接到“就地封存”的指示。在这四年里，自然有当地的文人雅士，或是附庸风雅的地方官吏索要数件，用来把玩或送人，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也就开始了。即便在藏经洞被重新封闭之后，门锁的钥匙也由王道士保管，他随时都可以打开，里面的东西想拿就拿。

罗振玉当时是清政府的学部参事厅行走，学部考试襄校官，他先找了学部左丞乔树楠，请求他表态处理这件事。学部的电文下达到甘肃省府，再转发到敦煌县衙，然后通知王道士清点藏经洞剩余的文书，准备送往北京保存。王道士知道他发现的宝贝要被别人拿走了，赶紧偷偷从藏经洞取出一大批文书，悄悄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以备将来出售，换取“香火钱”。

官方派来押运藏经洞文物进京的人，是新疆巡抚何彦升。这个负责押运文物的何大人，对这些珍贵写本也不怎么看重，只是雇了一辆大车，把古写本扔到车上，也不装箱，只用草席稍做捆绑，就上路了。沿途的大小官员，有兴趣的就拿几卷回家，这叫“雁过拔毛”！等东西运到北京，这个何大人并没有把藏经洞文书送往学部，而是让他儿子先把大车拉到岳父李盛铎家，与几个亲朋好友一道，把所有经卷写本翻看一遍，挑出最有价值的部分，私藏起来。为了怕缺少件数被人发现，就把较长的卷子撕成两半充数。后来，李盛铎又把偷藏起来的写本，以8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人。^①

这批残存的藏经洞文书最后运进官方的京师图书馆时已是七零八落，但总算是中国人自己的收藏。罗振玉抢救敦煌遗书的历史功绩，后人应当铭记。

罗振玉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拯救清朝内阁大库积存的历代档案和古籍。清朝末年，这些档案和古籍堆积如山。1909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官方准备销毁这些珍贵历史资料，罗振玉知道消息后，赶紧找人把这些资料移归学部保存。清王朝两年后灭亡，中国历史进入民国

^① 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时期，这批资料移交给了历史博物馆收藏。

令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博物馆后来竟然以经费短缺为由，将这批资料的绝大部分当废纸卖给收破烂的纸商，换得银币四千元。罗振玉追寻到废纸收购店，以高于原价三倍的价钱，将这批重达十五万斤的档案重新购回。由于罗振玉的不懈努力，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料终于保存了下来。

而第三件大事，让他背上了“汉奸”和“卖国贼”的恶名。1924年，罗振玉奉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之诏，进入故宫，在南书房做事。军阀冯玉祥占领北京后，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罗振玉和一些大内高手护着溥仪化装潜逃到天津，并开始与日本军政界的重要人勾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为日本侵略扩张、分裂中国的政策服务。1932年，罗振玉追随溥仪，来到长春，积极筹建伪满洲国，并充任临时政府督办和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1940年，罗振玉因心脏病去世。（图8）



图8 罗振玉像

从这三件大事看，罗振玉这个人，既是保护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清宫内库档案的民族精英，又是出卖国家利益，为日本侵华战略服务的民族罪人。

藏经洞剩余写本被运往北京收藏后，敦煌的“悲剧”历史是否就结束了呢？

自从藏经洞发现的古代文书和绘画被运往伦敦、巴黎和北京之后，王道士偷偷藏起来的那批文书就成了外国探险家争夺的焦点。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和俄国的鄂登堡都从王道士手中分别弄到了一批藏经洞发现的经卷文书。同时，他们也把注意力转向洞窟壁画和彩塑，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绘制了洞窟的考古测量图。

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藏经洞文献写本的研究上。罗振玉首先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开始在中国学界介绍敦煌文献，王仁俊则刊行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还和蒋斧合编了《敦煌石室遗书》，刊布敦煌文书11种。这些都是在伯希和六国饭店书展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反映了中国学者抢救性研究敦煌文献的紧迫感。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还出版了《石室秘宝》甲乙两集，破天荒刊印了四幅敦煌壁画的照片，使世人得窥敦煌石窟艺术的风貌，十分难得。

还有一批中国学者，远涉重洋，去伦敦和巴黎的图书馆抄录被斯坦因、伯希和拿走的敦煌文献，其中刘复（半农）在法国留学四年，抄录了大量的法藏敦煌文献，分类编排，于1925年



出版了《敦煌掇瑣》一书，分上、中、下三册，为国内的敦煌研究提供了大批珍贵资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去欧洲抄敦煌卷子是很热门的留学目的。当时去伦敦和巴黎抄敦煌卷子的中国学者为数不少，他们中有的政府出钱的“公派”留学人员，有的则是完全自费。其中一个人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后来的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他当时变卖家财，自费去欧洲抄录敦煌卷子，收集了大量文字资料回国，可是一回来就遇到抗日战争爆发，带回的资料全部毁于战火，但他仍然坚持研究，终成一位杰出的敦煌学家。

这些从欧洲抄回来的“敦煌文献”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正反两方面：既有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丰富文字资料的正面作用，也有使许多人不再重视国内收藏的敦煌文献的负面效果。有感于此，曾经在欧美留学十多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在为陈垣先生所编的北京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目录，即《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时，对此提出了批评。

敦煌莫高窟的下寺，也就是王道士当年居住的地方，现在是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馆门前放着一块标志性的巨石，石头上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下面的落款是陈寅恪。（图9）实际上，这句话，既非陈寅恪所说，而且他也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那么，陈寅恪先生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陈寅恪先生当时是针对那些只看重从欧洲抄回来的资料，而忽略本国自己收藏的敦煌卷子的人说这番话的。他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里的“或曰”二字，就是“有的人说”，并不是陈寅恪先生自己这么说。而且，接下来，陈寅恪就对这个说法表示不能认同。他接着说：“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显然，陈寅恪先生不同意这



图9 莫高窟下寺陈列馆前标志巨石

种说法，而且举了几个例子来反驳这种说法。

那么，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要把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反其意而用之”，硬把他当时反对并举例批驳的说法，强加于他呢？这是因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而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确实有赖于学者这种知耻而后勇的爱国情怀。所以，不管这句话是谁先说的，它总是借了陈寅恪先生的转述而得以流传开来，并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投身到敦煌学的研究中来，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陈寅恪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藏经洞文献的研究上，而莫高窟的几百个石窟，仍然静悄悄地躺在戈壁深处，无人问津。王道士仍然是莫高窟的“主人”。

在敦煌西边的吐鲁番和库车，大批的石窟壁画已被德国和俄国的考古探险家用刀锯切割下来，送回本国的博物馆。

1924年1月21日，敦煌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负责人华尔纳（Landon Warner），脚穿深筒皮靴，头戴“牛仔帽”来到了莫高窟。（图10）这时的藏经洞已是空空如也，洞内最好的写本和绘画早已被斯坦因、伯希和拿走，剩下的卷子也已运往北京的图书馆收藏。王道士偷偷藏起来的那批写本，也陆续被后来的日本人和俄国人买走了。面对空空的藏经洞，华尔纳只好把注意力转到石窟壁画和彩塑上来。华尔纳对此是早有准备的，他先给了王道士70两银子作为“布施”，然后提出要取走一些壁画。王道士马上表示同意。



图10 华尔纳像

华尔纳没有像德国人在吐鲁番和库车那样用锋利的刀和钢锯切割敦煌壁画，而是采用了一种刚发明的壁画截取新技术。发明这种技术的人，是哈佛大学的青年教师汤姆生（Daniel V. Thompson）。他发明的这种壁画截取技术原来是用于截取意大利古代教堂壁画的，现在华尔纳准备用来截取敦煌壁画。其原理，是先将一种透明的液态胶喷在纱布上，然后覆盖在要截取的壁画上，等胶基本干后，把纱布从墙上揭下来，这时候，壁画的表层就会被沾在透明胶上，运回博物馆之后，再用化学液体涂抹，取下带有壁画的透明胶，再将其永久固定在木板上。这种技术当时刚发明，还在实验阶段，效果看来并不好，因为华尔纳当年粘走壁画时，很多颜料残留在墙面上，未能完全揭下，破坏了壁画的完整性。（图11）

华尔纳第一次去敦煌时共待了7天，“用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二十余幅”。据常书鸿先生20世纪50年代统计，华尔纳1924年“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坏的初盛唐石窟壁画，计26方，共



图11 华尔纳从莫高窟用特制胶水揭取的敦煌壁画（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萨可乐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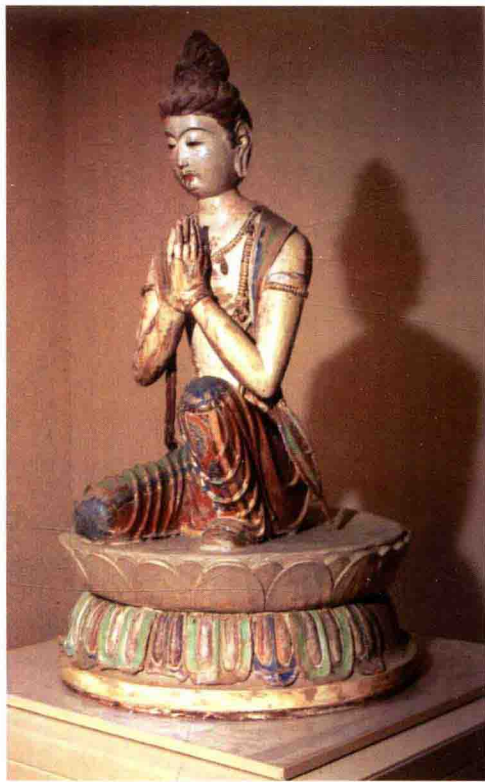


图12 莫高窟盛唐第328窟内被盗走的供养菩萨像（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萨可乐博物馆）

计22006平方公分”，约3.2平方米。另外他还拿走了一件精美的唐代彩塑菩萨。（图12）

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对敦煌第323窟内斑驳残损的壁画和第328窟内空空的塑像底座时，仍然会对华尔纳用所谓“先进技术”破坏性地掠夺敦煌壁画和彩塑的行为深感愤怒。

1925年，华尔纳再度来到中国，而且带来了那个发明喷胶粘取壁画技术的年青同行汤姆生和另外两位负责摄影和测量的专家。不过，此时的中国，形势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英国巡捕枪杀爱国学生和抗议民众的“五卅惨案”，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受到严重伤害，爱国热情高涨，中国知识界对外国来的考古探险家非常警惕，呼吁各级政府对他们严加限制，华尔纳等人虽然到了敦煌，基本上是空手而回。

莫高窟无人看管的局面仍在继续，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也在继续。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一批狂热的艺术家相继来到敦煌，这种局面才彻底改变。

第一个来敦煌的艺术家，是张大千（图13）。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家里很有钱。1940年，张大千去的敦煌。一开始，他只是想去简单看看，游览一下西北风光，体会一下异族风情，看看敦煌是否真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壁画。但到了敦煌莫高窟之后，他被满眼色彩斑斓的壁画震住了！他说：“了不得！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下半年还不够！”最后，他在敦煌足足工作了两年半。共画了三百多幅临摹作品，平均每两三天就得完成一幅精细的临摹画，其工作量之大，普通画家是很难胜任的。

张大千在成都和重庆举办了临摹的敦煌壁画大型展览，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中